



□ 刘正山



本性突破，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科幻片等，已经成为观众喜爱的类型；文艺片不断获得突破；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关注社会问题，获得各方好评；奇幻、古装类型电影，可圈可点；动画电影，日益发力。在这些影片中，极具代表性的有：动作片《战狼2》、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等。

电影产业体系完整化。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电影产业体系。前期阶段，包括融资、筹备期或前期制作等。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目前的电影融资渠道多元化，除了传统的银行融资、股市融资之外，私募基金、专项电影基金、互联网金融等，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随着“绿灯系统”的逐渐引入，专门提供项目策划、可研、评估等服务的专门公司或者影视公司设立专门的部门，已较为常见。制片阶段，3D预演、专门的制片管理软件的介绍、完片担保机构的介入、各种现代制片管理手段的引入，制片日益现代化。宣发阶段，除了传统发行模式，互联网发行的兴起、互联网营销手段的创新、电影的跨境贸易等，得到迅速发展。放映阶段，电影院线公司发展成为我国电影行业中连接电影发行方和影片放映方，互联网播放平台则为部分难以以上院线的电影、适当窗口期的电影和网络大电影提供了渠道。衍生产业，即基于电影开发出来的各种产品，例如玩具、道具、纪念品，以及主题公园等，尽管这部分的经营占比尚不够大，但未来是电影收入的重要渠道。电影建设、制造与服务业。电影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电影院、电影产业园区、电影拍摄基地建设等项目。电影制造业，主要为与电影拍摄、放映等相关的设备制造业。电影服务业，包括电影器材销售业务，以及其他影视服务业务，如电影演艺经纪业务、电影人才培养等等。其中，我国在巨幕的研发、影视拍摄基地建设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电影产业政策支持体系日益完善。我国电影行政主管部门，紧密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适时推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形成了日益完善的电影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体系。从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14年七部委《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国家从税收、土地、补贴等各方面促进电影产业的发展，标志着电影产业政策支持体系的正式建立。2017年3月1日，《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施行，为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从法治化角度确立了电影产业政策支持体系，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2018年，新一轮机构改革，由中宣部统一管理电影工作，这是加强党对电影工作全面领导的战略安排，是推动电影事业持续繁荣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

中国电影“走出去”迈出坚定步伐。近年来，我国电影加快“走出去”步伐，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提升我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国产电影全球发行平台“中国电影普天同映”启动以来，在海外发行了多部工业化水准较高的优秀中国影片。我国与海外电影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目前已经与近20个国家签订了合拍片协议。金砖国家电影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以及在各个国家的中国电影展等活动的相继举办，推动了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我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电影如《流浪地球》等，在海外获得良好的票房和口碑；我国的电影作品，不断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大奖；我国电影海外的市场占有率也不断提升，2012年中国电影海外票房收入为106亿元，2017年则迅速增长到4253亿元。这些成就均标志着我国电影“软实力”得到根本性提升。

电影品类与类型的丰富化。一是品类的丰富化。1978年，我国生产的故事片仅46部，动画片26部，科教影片289部，纪录片202部。1994年，故事片的产量首次超过纪录片；1995年，故事片的产量首次超过科教片，从此一直稳居各大品类的第一位。二是类型的多样化。近年来，我国类型电影获得根



□ 杨朝明 李文文

《春秋》的作者相传是孔子，关于孔子的作品也有不少，但如果请孔子本人推荐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作，他很有可能推荐《春秋》。孔子说自己“志在《春秋》”，其中表达的微言大义，彰显其正名守分的政治主张。

一个时代与一部经书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秋”曾是周代各诸侯国历史记载的代名词。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写成《春秋》，“春秋”竟成为他记载的这个时代和这部史书共同的名字。或者说，《春秋》曾是史书的通名，后成为春秋鲁国历史的专名。《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79年）的历史。《春秋》记涉诸侯国之间征伐、会盟、朝聘等事，还有日蚀、月蚀、星变、灾害等自然现象，以及祭祀、婚丧、城筑、狩猎、土田等社会生活。它为鲁国史书，却不只写鲁国历史，对各诸侯国多有涉及。

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诸侯国壮大，社会激烈动荡，以血缘宗法维系的政治体制面临重大变革，以王道传统为核心的政治精神趋向崩溃。在孔子看来，这是一个天下无道的乱世，他周游列国，到处奔走，希望君主们为政以德，不要背离王道传统，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爱民敬事，上下相亲，社会和谐。

但是，期愿已远远不足平镇当时滔滔之天下，在“争于气力”的春秋之末年，其主张的“修己以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在这样残酷却又无奈的现实面前，自己该何去何从？于是，他想到通过历史的记载表达个人的政治主张，“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依据鲁国的历史资料作《春秋》，将历史的真实记下来，寓褒贬，别善恶，以俟后人。

是的，惩恶劝善，字字针砭，正是《春秋》的特点。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

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在孟子看来，《春秋》是“天子之事也”，他是在替圣王制法。孔子本人非常看重《春秋》，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以后，后人纷纷进行研究解读，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竟形成了一门影响深远的显学即“《春秋》学”。人们认识到，《春秋》以寓王法，厚典、用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一部《春秋》，为后世虑，意义十分深远。

微言，需要“知微之显”

《春秋》语言简略却意义深奥，通过“属辞比事”将政治之法垂于后世。《春秋》以史载经，是经世大法，昭示中华史学的庄严使命。《中庸》说“入德”之法要“知微之显”，欲知大意，先明微言。

《春秋》微言，首见言辞之微。《春秋》记事，用语谨严，最少1字，最多者也只有40多字。言辞简略，却用词考究，咀嚼有味，褒贬善恶就在简略的叙述之中。比如“弑”是以下犯上的专用词，表达乱相横生、君臣父子相残；“奔”是逃亡的特指，可以看到流离失所，无所归依。由君主的命运，可见一般百姓的离散；处处“攻”“伐”，可见春秋无义战。《春秋》微言，就在这个“微”中褒善贬恶，扬善去恶，拨乱反正。这种叙事方式，被称为“春秋笔法”，以史载经，以文载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微言，还见事态变化。董仲舒云：“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小过不慎，终酿大祸，以致亡家败国。司马迁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很多灾祸并非突然发生。《春秋》叙事令人洞悉原委，鉴往知来，从而防微杜渐，彰显了礼的意义。礼深入人心，可经国济世，让人守正不阿，坚守信念，从而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春秋》微言，要在守常不乱。在《春秋》中，守常与权变并不矛盾，

“经”与“权”是相辅相成的存在。其时措之宜，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贵在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唯有善会者才能得其大旨。胡安国称《春秋》为“史外传心之要典”，故先儒说经于《春秋》特为矜慎，义精仁熟者方能知其所择。

大义，在于观念和价值

任何有序的社会与文明都需要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和是非标准。《春秋》看似一家之言，实则承继上古三代，继往开来。其远述尧舜之道，近守文武之法，唯有奉行王道仁政，知荣知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是经世大法。正如西汉司马迁所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其唯有天下为公的格局、内圣外王的精神，才能社会和谐，人心和顺，天下太平，这才是《春秋》“微言”中的“大义”。

钱穆先生认为，《春秋》在当时已崭然成为一新史，是当时的大“通史”，亦可说是当时的“世界史”。有人类，有世界，就逃不掉历史批判。所谓历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另一部分则是道义的，道义由自然中产生。自然势力在外，道义觉醒则在内。《春秋》则建立出一大道义，明白教人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此项道义，论其极致，乃与历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谓是天人合一。《春秋》和合历史自然，和合天人之际，昭示是非得失。天下国家得此大义则治，失此大义则乱。所谓“大义”者，大纲、人伦、道理、教化尽在其中，亘古不变。

可以说，那时的诸侯国之间，唯有达成共识，遵守规则，才会和平与稳定，因此诸侯会盟就应有共同的遵循。然而，总是有背盟、叛盟者打破和谐与和睦的格局。历史教训也警醒着今天的世界，天下为公，四海一家，遵守公约，合作共赢，这才是大义。

要旨，正名守分而已

司马迁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诸圣先哲所叮咛者，多在警醒人们回到自己的本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此即《大学》所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人之为人，便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大道之行”便是“天下为公”。所谓“公”，指人的公共意识与公德意识，强调的是“人之为人”和“人之异于禽兽”的那些“礼义”，那些为人处世的那些根本原则，那些基本的人伦法则。《春秋》文字简略，于是有了解释《春秋》的《左氏传》（简称《左传》）以及《公羊传》和《谷梁传》。《公羊传》《谷梁传》详其义旨，通过对《春秋》文本的解说，阐发其内涵；《左氏传》详其本事，通过对《春秋》史实的进一步铺陈，彰显其思想。更能看出《春秋》意义饱满，内涵丰富。

读《春秋》，要将其置于中华道统的宏阔体系中，置于“六经之教”体系中，与《诗》《书》《礼》《乐》《易》并谈。宋儒胡安国说：“《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在他看来，六经之有《春秋》，就如法律有了断案的准则，不学此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这个评价可以说无以复加了。读《春秋》要把握要领，理而不乱。这个要领，应该就是正名守分，就是明是非，重人伦，敦教化。



今年是李大钊诞辰130周年。李大钊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国教育史上，李大钊也是一位具有开创精神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教育实践，提出了很多科学的教育理念。回顾李大钊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用历史唯物的观点阐释教育的本质。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说，“我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教育的本质是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李大钊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经济构造（即物质构造）才是基础构造，基础构造决定表层

构造。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必然要受到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包括教育在内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即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为教育提供物质基础，教育的发展也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来深刻阐明教育的本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具体应用。

第二，平等教育观。李大钊反对社会的不平等，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了《劳动教育问题》一文。在文中，他强烈呼吁为工人争取受教育权，说“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个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他主张社会应通过多开设劳工补助教育机关，来改变少数人受教育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受不到教育的状况，少做点工节省出来的时间，正是工人非常宝贵的时间，可以去读书，去补习技能，是使自己得到发展的神圣时间。李大钊的平等教育观不仅体现在为工人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同时还体现在他对妇女接受教育问题的关注。他提出妇女应当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认为接受教育是妇女实现自身解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针对当时社会上对妇女的种种歧视，他指出：“占全国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

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

第三，青年教育观。李大钊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饱受苦难，就在于缺少有理想、有知识、有使命、有担当的青年。中国的希望，首先在于青年人的觉醒，只有青年人觉醒了，才能担当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任。他指出，“旧民族之复活，非其民族中老辈之责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因此，“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高度重视对青年人的知识教育和人格养成，尤其注重对青年人的爱国主义教育。他在北大担任图书馆馆长期间，把图书馆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拓青年人的视野，丰富青年人的知识，培养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在《新青年》上刊发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唤醒了青年人的斗争精神，为青年运动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在教育方式上，李大钊注重学校教育与社会活动相结合，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号召广大青年到劳动群众中去，走出了一条青年教育与工农结合的新路径。在他的指导下，革命青年主动到农村帮助农民建立协会，开展常识教育，宣讲革命精神，鼓励广大农民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李大钊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也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努力。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开创精神的教育理念，对于今天我们积极推动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 戴菁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